

云寄真情，静候友朋

——《停云》系年及诗旨辨说

魏梦玉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3178069706@qq.com)

摘要: 对于《停云》的诗旨解读, 历来众说纷纭。诸如汤汉、刘履等人认为寓规谏之意; 蒋薰、王尧衢等人认为是春日思友诗; 许红英、蔡丹君的孝亲人伦诗; 龚斌、杨勇主张调和说, 既思亲友, 又寓时政; 各家解读的主要分歧在于此诗到底有无隐喻和寄托, 文章在对《停云》异文搜集和判断的基础上, 结合陶渊明享年与本诗系年进行了辨析, 遵从《宋书》记载渊明享年63岁之说, 认为此诗作于元兴三年(公元404)渊明40岁时, 应是一首春日日常思亲友诗, 并暗示自己不愿出仕之意, 但无“忠晋”政治隐喻色彩, 是陶渊明独特的人生之道和“真”情的体现。

关键词: 《停云》; 陶渊明年谱; 诗旨; 探析

引言

《停云》在体式上是一首四言诗, 一首诗四章, 从诗命名、小序和四章的行文组织, 可以看出是《诗经》范式体下的作品。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 惟陶公最高, 《停云》、《荣木》等篇, 殆突过建安矣。又曰诗四言犹难, 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1]”在诗歌发展史上, 诗歌形式的演进, 由四言诗到五言诗, 又形成七言诗, 古体诗发展而形成近体诗等等。四言是《诗经》的主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很多, 曹操、嵇康、陶渊明各有风格。建安时期曹操四言诗开辟了宏大境界, 即所谓“建安风骨”, 到陶渊明、嵇康时四言诗已经有些萎缩了, 题材变得较为日常、普通, 较多书写个人感叹或赠答亲友。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区别,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 “若夫四言正体, 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 则清丽居宗”, 意思是四言诗的正宗体制, 就以雅正滋润为本, 五言诗的流行格调, 就以清新艳丽为主[2]。但是细读诗歌, 会发现《停云》这首诗写的却是比较清新的, 以“云”作为意象, 与陶渊明《赠长沙公》《命子》等四言诗写宗族历史的内容在风格上有较大不同, 按照《诗经》的说法是一个侧重于《风》抒写一己之感, 一个侧重于《雅》、《颂》写历史政治。

全诗如下:

停云, 思亲友也。罇湛新醪, 园列初荣, 愿言不(曾本云, 一作弗。)从, 叹息(曾本云, 一作想。)弥襟。(苏写本此下有云尔二字。)

霏霏停云, 濛濛时雨。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静寄东轩, 春醪独抚。良朋悠(和陶本作攸。注: 一作悠。)邈, 搔首延佇。

停云霏霏, 时雨濛濛。八表同昏, 平陆成江。有酒有酒, 闲饮东窗。愿言怀人(曾本云, 一作仁。)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 枝条(曾本云, 一作叶。)再(曾本作载, 和陶本同。)荣。竞用新好, (曾本云, 一作朋新, 一作竞朋亲好。苏写本云, 一作竞朋亲好, 焦本同。焦本注云, 宋本一作竞用亲好, 非。新好, 指春树。)以怡(李本作招, 曾本、苏写本同。又曾本云, 一作怡。焦本云, 一作招, 非。)以怡余情。人亦有言, 日月于征。安得促席, 说彼平生。(平生, 平时。)

翩翩飞(曾本云, 一作轻, 苏写本同。)鸟, 息我庭柯。敛翮闲止, (曾本作上。注, 一作正。)好声相和。岂无他人, 念子实多。愿言不获, 抱恨如何[3]!

1 历代对《停云》异文的选择

《陶集》的异文向来很多,《停云》一篇中也有几句涉及异文,并经历代注家注解后影响了诗旨的解读,各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蔡宽夫诗话》云: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可见自宋元以来,《陶集》的字就已经有很多讹异了。各本也多正文之下,注有“某本作某”等字样,以供读者参考。历代《停云》中影响诗旨解读的异文,梳理《陶渊明集版本荟萃》一书,详见表1:

表1 《陶渊明集版本荟萃》梳理得历代《停云》中影响诗旨解读的异文

上册	
1.《陶渊明诗一卷、杂文一卷》 晋陶潜撰,宋绍兴三年(一一九二)曾集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曾注:一作朋新,一作竞朋亲好。
2.《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晋陶潜撰、宋汤汉注,宋淳祐元年(一二四一)汤汉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汤注:谓相招以事新朝。
3.《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总论一卷》晋陶潜撰、宋李公焕注,元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注:谓相招以事新朝也。
4.《陶靖节集十卷、总论一卷》晋陶潜撰,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蔡汝贤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注:谓相招以事新朝也。
5.《陶靖节集八卷》晋陶潜撰,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杨时伟序刊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6.《陶靖节集八卷》晋陶潜撰,明凌濛初辑评、凌南荣校,明末朱墨套印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亲好,以怡余情。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7.《陶元亮诗四卷》晋陶潜撰,明黄文焕析义,明末刻本	黄注:闲饮靡从,中情灰冷,甘付理乱于不闻矣。忽睹再新,复生枝春。竞用字,招字承前首活选。
8.《陶诗集注四卷》晋陶潜撰,宋苏轼撰,清詹麐锡纂辑,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宝墨堂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注:谓相招以事新朝也。
9.《陶诗汇注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晋陶潜撰,清吴瞻泰辑,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程崧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吴注:园树虽凋,犹有再荣之日,世界虽坏,岂无再转之手。
中册	
1.《东山草堂陶诗笺五卷、首卷一卷》晋陶潜撰,清邱嘉穗评注,清康熙间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邱注:以树有新好反兴人无旧欢。旧注谓招以事新朝意,则兼比也。
2.《陶靖节诗四卷》晋陶潜撰,清蒋薰评,清周文焯订,清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最乐堂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3.《陶诗汇评四卷东坡和陶合笺四卷》晋陶潜撰,清温汝能汇评,清嘉庆九年(一八〇四),温氏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朋亲好,以怡余情。
4.《苏东坡书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宋苏轼书,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摹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5.《陶诗编年一卷》清陈澧编,清抄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朋亲好,以怡余情。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6.《靖节先生集十卷、首一卷、诸本评陶汇集一卷、年谱考异二卷》晋陶潜撰,清陶澍集注,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周詒朴刻本	汤注谓相招以事新朝。各本如此,焦本作竞朋亲好,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竞用新好非,怡一作招非。
下册	
1.《陶渊明文集十卷》晋陶潜撰,光绪五年(一八七九)番禺俞秀山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2.《笺注靖节先生集十卷》晋陶潜撰,朝鲜翻刻明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夏埙序刊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谓相招以事新朝也。
3.《须溪校本陶渊明诗三卷》晋陶潜撰,明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朝鲜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4.《陶靖节集二卷》晋陶潜撰,明何孟春注,朝鲜翻刻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5.《陶渊明集八卷》晋陶潜撰,罗陆等编,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五二)朝鲜忠州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6.《陶靖节集十卷》晋陶潜撰,日本尺璧馆旧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7.《陶靖节集十卷》晋陶潜撰,日本宝历十一年(一七六一)刻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8.《陶渊明集八卷》晋陶潜撰,日本近藤元粹选评,日本青木嵩山堂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铅排线装本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解读与文本选择相呼应，异文与文本阐释，也是诗歌史选择的结果。梳理从古至今《停云》的异文流变，文本流动的脉络得以更清楚地呈现出来，分析定型之后的异文如何影响了后面的解读。宋末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删去异文，系陶集之一次系统整理，通行甚久，为世所重，收入《四部丛刊》。故明清时，注家所见文本几乎都是李公焕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解读。

由上表可以看出，第一个异文是“枝条载（再）荣”，何孟春注：“东园再荣之树，指历事新朝之人也”，他认为“再”字有所寄托，暗喻晋宋易代之际历事二朝之人。这种注解带有诗学渊源传统，蔡丹君在《〈陶渊明集〉文献与易代诗学传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历代文学批评对陶渊明诗文内容中‘易代’之义的阐释和发挥，对《陶渊明集》的编纂、注评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陶集的读者们基于此发掘了陶集诗文的歧义性和隐喻修辞等特征。大多读者在解读陶渊明作品时，往往着力渲染诗人的‘易代之悲’，将其看做一位不事二朝的‘忠臣’。尤其是宋代，理学兴盛，社会风气崇尚道德，南宋人对陶渊明易代之义的解读，很快反映在了陶集文献上，例如约刻于咸淳元年前后的汤汉注四卷本《陶渊明诗注》。明末用于陈说士人们末世之痛苦、预感易代之焦虑的陶集版本不在少数，为陶集易代性的建构迎来了新的高潮。例如，约略刊于崇祯十五年（1642）黄文焕注解的《陶诗析义》亦是其类。[4]”鲁迅先生曾说：“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5]”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依然关注着政治时局。萧统《陶渊明集序》说陶渊明诗的特点在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3]，除《述酒》之外谈到政治的诗歌也有很多，可以窥探出渊明对时局的思想与态度。但是若注家过分滞执于他对晋室衰亡的忠愤，例如黄文焕的《陶诗析义》，几乎将陶诗每一首都诠释为激愤壮烈之诗，这种极端的行为并不可取。王瑶先生对此有过中肯的评述：“渊明固然不满意刘裕的行为，有所反抗和批判，对晋室也有相当的依恋，但他归田隐居之时距晋亡尚有十五年，是不可能简单地用忠于晋室来解释的。[6]”因此我们在解读陶渊明作品时需以文本为基础，从多角度出发，综合分析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认知。上表中除曾本和汤汉本作“载”字，其余皆作“再”。二字孰优孰劣，需在细读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得出较为正确的判断。“载”，有初始义，例如“春日载阳”。载荣，即始荣。杨勇《陶渊明集校笺》：“载，一作再。今皆依曾本。《尔雅》疏引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7]”龚斌认为“东园之树，枝条载荣”，二句实写“园列初荣”之景[8]。“载”与“初”相对照而言，“序曰初荣，诗曰再荣，序曰不从，诗曰靡从，意义同异，互相阐发。[9]”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潘尼《已日》诗：“霭霭疏圃，载繁载荣”，也都选用“载”字。若是“枝条再荣”，将“再”释义为“再一次”或许更佳，可翻译为“春树的枝条再次繁茂”，但若联系到时代变迁则不妥。

第二个异文是“竞用新好，以招（怡）余情”、“竞朋亲好，以怡余情”，从宋、明流传的版本来看，多数是“竞用新好，以招余情”，只有清代温汝能和陈澧作“竞朋亲好，以怡余情”。近人对此句的文本选择见表2：

表2 近人对“竞用新好，以招（怡）余情”和“竞朋亲好，以怡余情”的选择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 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竞用新好	以招余情 雨灰人情，树招人情，鸟语揶揄 独坐，居然若嘲人矣。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 华书局 2018 年版	曾本云，一作朋新，一作竞朋亲好。苏写本云，一作竞朋亲好，焦本同。焦本注云，宋本一作竞用亲好，非。新好，指春树。以怡李本作招，曾本、苏写本同。又曾本云，一作怡。焦本云，一作招，非。 新好：指春树。	以怡余情 李本作招，曾本、苏写本同。又曾本云，一作怡。焦本云，一作招，非。 怡：娱乐。
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竞用新好 用，一作「朋」。新，一作「亲」。或作「竞朋亲好，以怡余情。」今皆依曾本。	以招余情 说文：「招，手呼也」汤注：「谓招以事新朝。」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竞朋亲好 竞朋：犹高朋。 亲好：亲戚好友。	以怡余情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 华书局 2003 年版	竞用新好 用、新：一作「朋」、「亲」。	以怡余情 怡：原作「招」，底本校曰「一作怡」，据改。
孙均锡《陶渊明集校注》中 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竞用新好 新好：新的美好姿色，即春来载荣的美姿。	以招余情 招：招引，引逗。

可见近人多依从宋本，如汤汉、李公焕等人的本子，选择“竞用新好”，只有龚斌选择“竞朋亲好”，并注解：“竞朋”，犹言“高朋”。《尔雅·释诂四》：竞，高也。陶氏《祭从弟敬远文》亦云：“乐胜朋高”矣。亲好，谓亲戚好友，义同亲知。新，亦亲字之误。[8]徐复曰：“六朝之时，‘朋’或写作‘用’。此‘用’为‘朋’之别字。袁行霁认为：“徐说固有据，然联系上下文，仍以原作为佳”，袁先生从原文语境出发，得出了判断，“竞用新好”更佳。“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意为东园的树木枝叶开始芬芳繁茂，春树春花展新姿，使我心情愉悦。若是“竞朋亲好，以怡余情”，则不符合上下文语境，亲友未至，如何使孤独的渊明感到愉悦？从诗歌的语言结构来看，《停云》句式整齐，富有章法结构，诗四章，章四句，每章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严密的结构也体现出“竞用新好”一句写景，是为更佳。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3]”陶渊明看到树木枝叶交错成荫，听见候鸟不同的鸣声，心中十分高兴，这句话正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招（怡）余情”，自曾集刻本作“以招余情”并经汤汉注解“谓相招以事新朝”，后代有十八家均依此异文，选择“以怡余情”的并不多，仅有四家，汤汉的注解明显带有一种政治隐喻的意味，出仕的亲友招渊明入新朝为官。黄文焕《陶诗析义》：“雨灰人情，树招人情，鸟语揶揄独坐，居然若嘲人矣”[9]，这里把“招”理解为“招引”。《说文解字》：招，手呼也。“招”与“怡”字的选择，结合诗前小序“停云，思亲友也”，此诗序言中已经说明了诗所写的内容是思念亲友，下雨路阻，亲友不至，无聊之际，春树初开的繁荣之姿正可以使渊明感到一丝喜悦与安慰，故“怡”字更佳。

钱志熙先生在《李邕〈古诗四言〉帖在古诗校对方面的价值》一文中也谈到“竞用（朋）新（亲）好，以招（怡）余情”一句的异文问题，钱先生起初认可“竞用新好，以招（怡）余情”，但后来发现李邕书写的《停云》墨迹是“竞朋亲好，以怡余情”，李邕的书法是可见的资料中最早的本子，因此钱先生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并从诗学修辞的角度为“竞朋亲好，以怡余情”作证，认为此句更朴素[10]。可见文本选择对文本解读的重要性，背后涉及价值阐释与文本阐释的问题，体现了文本、异文与价值阐释的相互塑造。

以上分析《停云》的语言和章法结构，个人更倾向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虽然不一定是陶诗原文，但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聚焦“异文”，并非为了“重建”或“还原”《停云》诗，而是借此方法呈现文本流动过程中所隐含的历史语境问题，以文本为中心，力求对文本进行客观的解读，不至落入穿凿附会的陷阱。

2 历代对《停云》诗旨的阐说

历代因对此诗的异文选择不同，后代又受到汤汉、黄文焕等人“以骚注陶”的注诗方式影响，他们从不同角度审视这一诗篇，从古至今关于该诗的解读与争论纷纭，各家说法不一。梳理《停云》诗的研究状况，对于此诗的诗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2.1 寓规谏之意

此说认为《停云》诗是渊明对晋宋易代之际，历仕于宋之亲友的规谏，劝戒亲友不要出仕。诗中写自然环境昏暗，“停云”、“时雨”，以喻宋武阴凝之盛，而微泽及物。“表昏”、“路阻”，路阻不通，暗喻社会政治环境黑暗，晋人无可仕之道。汤汉、刘履、黄文焕、沃仪仲为此说代表，他们欲由时事深求此诗“规谏之意”。如宋代汤汉注解“八表同昏，平路成江”，“二句盖寓飏回雾塞，陵迁谷变之意”，李公焕与汤注同[9]。刘履《选诗补注》：此盖元熙禅革之后，而靖节之亲友，或有历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诗，以寓规谏之意焉。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注解“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二语寄愤世事，万恨交集，同字平字尤有余惋”。注解“八表同昏，平路成江”：世道陆沉之苦，此路阻加甚。黄文焕分析全诗：“四言皆匡扶世道之热肠，非但离索思群之闲惊也。‘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平陆成江’，日月山河，交失其恒，此复何等景象，可乏同心丞商匡扶哉！园树虽凋，犹有再荣之日，世界虽坏，岂无再转之手。所以朋俞邈，而席俞思促也。鸟闲止而有相和之声，人闲饮而艰相就之朋，处处回环阐映。雨灰人情，树招人情，鸟语揶揄独坐，居然若嘲人矣！比兴愤极，高处在使人骤读之不觉，并亲友亦属蒹葭伊人之虚想[9]。沃仪仲曰：“伊

阻”、“成江”，分指世运。“八表同昏”，专咎臣子，一语两章复用；且先揭于阻、江之上，尤有味，正见举世暗浊，无一明眼堪扶社稷，故至于比，我即独身孤愤，济得甚事！乃难冀之世，复难冀之朋。末句“抱恨如何”，真当闷绝[9]。今人张德恒遵此说，他认为“‘云’象征渊明‘出仕之友人’，‘停’显示出渊明对友人出仕的态度，即不愿意友人出仕刘宋。而其内容也必含规劝、规谏意。诗之主旨是：思念、担忧远方的挚友颜延之[11]。

2.2 春日思友诗

此诗并无悲愤之意，只是春日思友之情。蒋薰、王尧衢、吴瞻泰、吴崧为此说代表。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刘履谓‘元熙禅革之后，或有亲友仕于宋者，靖节赋此以讽’。诗中无其意，惟‘竞用新好’句盖谓他人言耳，非所指‘念子实多’者”[9]。王尧衢《古诗合解》卷二：谓《停云》四首是《诗·秦风》、《蒹葭》之后的“千古怀人之作”。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一：“尊晋黜宋，固渊明一生大节，然为诗诂必乃而！如少陵忠君爱国，只《北征》、《哀王孙》、《七歌》、《秋兴》等篇正说此意，其余岂尽贴明皇、贵妃、安禄山耶？《停云》四章只思亲友同饮不可得，托以起兴，正如老杜‘骑马到阶除’，待友不至之意。定要待友来商逐逐安史之事，宁有是理哉？注中穿凿者槩从汰”[9]。吴瞻泰阐释诗旨时，重在辨析诗歌是否隐喻易代。他反对经学本位，持文学立场，分析诗人的真实情感，发掘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文学趣味。清代吴崧《论陶》曰：《停云》、《时运》、《荣木》三篇，人指为悲愤之作。虽箕子以狡童喻君，夷、叔以黄、农致慨，安在怀良朋、怀黄、唐有以异哉？但前二篇神闲气静，颇自怡悦，绝无悲愤之意。即曰憾曰慨，亦不过思友春游、即事兴怀耳。如指为求同心、商匡扶，殊属枝节；脂车策骥，正欲勉力依道耳，敦善耳。“孰感不至”正与“业不增旧”对照，亦不必牵合时事也。今人袁行霈赞同此说，他认为：寓规谏之意或由汤汉注所谓“想招以事新朝”引申而来。倘若就一二句断章取义，或可谓有感易代而发；若统观全诗，不过如诗序所谓思亲友也。但其孤独之感显而易见，或与其所处时代不无关系。从“岂无他人，念子实多”看来，或有一思念之具体对象，但究系何人已不可考[12]。

2.3 孝亲人伦诗

许红英从四言诗的发展和陶渊明的心路历程两个侧面，认为《停云》、《时运》、《荣木》三首诗是陶渊明早年拟西晋束皙《补亡诗》而作。她指出：汉末，在曹操邈下文人的努力下，四言诗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西晋时，四言诗创作已经逐渐衰落，但束皙却追慕古风，弘扬原始的儒家精神。《补亡诗·南陔》、《白华》讲孝子相戒与孝子的洁白；陶诗《停云》讲思亲友，都是在强调所谓的孝友人家[13]。蔡丹君：从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陶渊明集》的思想出发，萧统重视孝亲人伦，故认为《停云》居于卷首是带有思想内涵，与西晋傅咸的“六经集句诗”有《孝经诗》强调以孝事亲与君相类似，西晋时期重视以孝治理天下，四言诗也从不同角度来表达此思想。又从四言诗发展谈起，提出《陶渊明集》中四言诗大多有劝勉规谏之意，表达儒家伦理思想。“思亲友也”中的“亲”是亲友、亲人，有时特指父母。《停云》所叙是孝亲人伦之义而非寻常友谊，回归家园之召唤，是诗中回环往复的心声。因此《停云》诗之本义是劝诫身在官场之人回到家园，亲伦团聚[4]。

2.4 调和说，既思亲友，又寓时政

龚斌：汤汉、刘履、黄文焕诸人欲由时事深求此诗“规讽之意”，显然与诗序“思亲友”之旨相悖。吴瞻泰等认为此诗仅“待友不至之意”，绝无寄托，则又太浅。诗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又云“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一种独立苍茫，知己难遇之感溢于言表。辛弃疾《贺新郎》词云：“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辛词以意逆志，差可得渊明《停云》诗意趣[8]。杨勇列举吴崧《论陶》“亦不必牵合时事”和温汝能《陶诗汇评》“诗中感变怀人，抚今悼昔，一片热肠流露言外。若仅以闲适赏之，失之远矣。读陶者悉当作如是观”，两种观点，并指出“吴、温二说虽相反，而实相成，故并录之，以互见其意焉。[7]”

3 《停云》系年纷争与诗旨辨说

首先在异文选择上：前文论述了“以怡余情”和“以招余情”的区别，虽然并不认可汤汉注解“招，谓相招以事新朝”，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是必须承认汤汉、黄文焕等人代表了一种阐释陶渊明的路径，即“忠愤注陶”，认为陶渊明是“不事二朝的忠臣”，他对新朝抱有怨恨，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节义。这种解释确实符合陶渊明的生平与经历，符合史书对陶渊明的记载，例如《宋书·陶潜传》“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14]。所以错误的解读也有大的时代背景在支撑着，一方面陶渊明的历史形象就是这样“忠义之心”，这种解读方式从作家既有形象出发解释文本。另一方面，回到作者本身，陶渊明确实没有出仕刘宋，符合宋代人对他的定位。所以这种解读是有价值的，也符合汤汉理学家立场，理学家强调道德情感，品格、志节，南宋更是如此。陶渊明作为圣贤的代表与杜甫一样，忠心爱国，宋人注释杜甫也是如此，认为杜诗都有政治立场，反映了一代世风与文风，反映了历史传统，开辟了一个注释的途径。

其次，出于求“是”的角度：《停云》这篇经典作品到底有无“政治本事”，有无对时局的隐喻和寄托。若无，则诗旨就是思亲友，是一首日常的诗；若有，那么就需要找寻此诗的“本事”具体所指，再进一步分析寄托的内容为何。

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历来各家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没有定论。除了《宋书》记载六十三岁的主流观点之外，还有五十一岁（吴挚甫）、五十二岁（古直）、五十四岁（王辉斌）、五十六岁（梁启超、李文初）、五十九岁（圣旦、邓安生、龚斌）、七十六岁（张纘）等说法[12]。对陶渊明年谱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停云》诗旨的解读，故综合比较分析异文和年谱，企望对诗旨有一个准确、客观的解读。此诗作于何年？历来众说纷纭，概括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王瑶：最早对三诗系年的是王瑶注《荣木》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则本诗当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公元四零四），陶渊明年四十岁。按《停云》、《时运》、《荣木》三诗，都是四言四章，而且前冠小序，序文句法也完全相同，诗题又都是以首句命名，当为同年所作。”后来学者如逯钦立、孙钧锡等均从此说。

2、龚斌：认为《宋书》记载陶渊明得年六十三岁的说法有难圆之处，而梁谱、古谱中错误更多，他采取邓安生编订的陶渊明年谱五十九岁说。他对逯钦立、王瑶等人认为渊明得年六十三岁的说法进行批驳，元兴三年甲辰渊明四十岁时，正东下赴京口，为刘裕镇军参军，而《停云》诗写初春的时候，思念远方的亲友，《时运》诗写暮春时，渊明此年正奔波仕途，又岂能自春至夏“静寄东轩”、“偶景独游”？所以认为此诗不可能作于元兴三年，当在渊明归隐之后。又《荣木》诗序云：“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无成”意指学仕无成，更加可以证明此时渊明已经辞官。今系《停云》三首于晋安帝义熙四年（四零八），渊明四十岁，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从此，晋室朝政由刘裕独揽[8]。

3、刘履、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此盖元熙禅革之后[15]。

4、李文初：认同梁启超的说法，陶渊明的生年定在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公元372年），将陶渊明的诗文系年与其思想分期划分结合起来考察，分为四个时期。第一，出仕以前居家田园时期（公元372-399），以《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的“始作”为首次出仕；第二，宦游时期（公元399-405），这一时期从“始作镇军参军”时算起，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彭泽归田；第三，归田前期（公元405-417），本时期上限应从义熙元年（公元405）十一月之后算起，下限当据《饮酒》其九所说：“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或依《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潏田舍获》诗“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划在十二年后的义熙十三年丁巳（公元417）；第四，归田后期（公元418-427年）。他从陶渊明思想发展脉络考证，对《荣木》作于四十岁的说法进行批驳，认为《停云》、《时运》、《荣木》是其出仕前的作品[16]。

5、张德恒：认同邓小军先生的说法“《饮酒》诗不是作于东晋而是作于刘宋”[17]，考论《饮酒》诗二十首的主旨，认为《饮酒》二十首是渊明写给挚友颜延之的劝谏语，《停云》诗的主旨也与延之相关，当作于宋景平元年（423）春天[17]。

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基本公认《停云》《时运》《荣木》写于同一年，陶渊明四十岁时。但由于各家对陶渊明的享年有分歧，故陶渊明四十岁具体指哪一年便也产生了争论。上文已经提及，龚斌认

为陶渊明享年 59 岁，即义熙四年（公元 408）陶渊明 40 岁，此诗作于归田初期。袁行霈主 76 岁说，称《荣木》诗作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 391），陶渊明 40 岁。逯钦立主 63 岁说，认为此诗作于元兴三年（公元 404），桓玄篡位。享年不一致，那么就会出现互相否定的情况，没有结论。与其争执不休，不如回到最初的起点，最早记载陶渊明享年的是《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14]。据此，陶渊明四十岁时就是元兴三年（公元 404），二月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一般认为这一年陶渊明正作刘裕镇军参军，奔波仕途不暇。《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说：“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可见陶渊明正日夜赶路中。然观《停云》《时运》二诗，则与之完全不同，写的是在家乡时的安宁生活。《停云》诗：“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时运》诗写作者暮春独游：“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洋洋平泽，乃漱乃濯，眇眇遐景，载欣载瞩”。正因此，袁行霈、杨勇、龚斌看到了破绽，开始反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系年立证。如果前面论及的大前提不变，即元兴三年（公元 404）陶渊明四十岁时写的《停云》，那么有一种可能，他没有担任过镇军参军，则一切均可以说通。刘奕在《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第四节“镇军参军考”中说：“镇军将军不是刘裕，而是之前曾任会稽内史的谢轡。”并经过一番考证，证明陶渊明无可能出仕刘裕[18]。

还有一种解读，渊明享年 63 岁的大前提不变，但是三首诗不是写于四十岁，因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写作时间。例如黄文焕也赞成陶渊明 63 岁，但是却认为是东晋灭亡、易代之后写的；李文初也赞成 63 岁，但是认为是出仕前写的；张德恒认为陶渊明活了 63 岁，宋景平元年（423）写的。写作时间依然存在分歧，如果认为此诗有寄托，写于晋宋易代之际，那么就是把陶渊明当做“忠臣”看待，虽然系年不同但是都认为有所隐喻、寄托。由于无法确定此诗的政治本事为何，具体隐喻所指也不可知，故无法简单地将此诗理解为“忠于晋室”，结合上文对异文、文本章法结构的分析，也不认同此诗为一首政治诗，所以暂不认可这种解读。

蔡丹君认为“亲友”，不能直接指朋友，而是亲人。陶渊明与亲戚分居，但也有一些是住在一起，古代的家族一般都是聚居，比如陶渊明与陶敬远采药。《归园田居》其四“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带着自己的小辈，说明有亲人在附近居住。如果是亲人，则不应该如诗中所写那般想见却不得，十分悲惨。此外，诗中看不到专指亲人的指向，饮酒谈心一般还是朋友比较多，亲友反而少。蔡丹君认为《停云》居于首篇，想突出家庭伦理，实在过于牵强。古代文集的编纂有自己的传统和体例，一般把四言放在前面，五言放在后面，并无多少深意，与伦理关系不大。相较其他四言诗而言，《命子》、《赠长沙公》更具有伦理色彩。故不取此观点。

张德恒认为“云”带有影射，指出仕的友人，“停云”指不愿友人出仕刘宋。陶渊明诗文中出现“云”意象大约有 20 次左右。例如《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重云蔽白日，闲雨微纷纷”；《和郭主簿二首》其一“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岁暮和张常侍》“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咏贫士》其一“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於王抚军座送客》“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杨忠慧认为陶渊明借“停云”“重云”“寒云”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忧虑[19]，但忧虑何事并不知，这种解读带有归类“共性”特点，却忽略了文本个性，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汉魏晋文学中的物大多并不是自在的，而是被隐喻投射之物。陶诗中的“归鸟”、“松”都可以视为一己理想人格的投射，但陶诗中还有更多事物是自为、自在的，陶渊明写他们并无任何道德和政治隐喻的动机，根本只是因为它们可爱[18]。《停云》中因写自然环境的昏暗，往往被认为是隐喻政治环境的黑暗，其实不然，并无寄托。刘奕认为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疏而不绝、爱而不谐之隐，他指出：“对陶渊明来说，隐居的起点与终点都在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安顿一己之心。诗歌前两章写天昏路阻，友人无法到来，但后两章写雨停后春日美景，朋友依旧没有消息，那么渊明为何不外出访友，却一直在家等待？只是因为他不外求，只安身在自己的世界中，即有来无往，也暗示其不愿出仕，这是仅属于他的生活相处之道，也是他温润、真诚、兀傲之处。[18]”此诗便体现了渊明思念、等待友人的真情实意。朱光潜先生也说：“陶渊明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

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的同情[20]。同样指出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物多是其真情的体现，无政治时局隐喻之说。

4 结语

中国古典文论是文本中心论，和当代西方文论以读者为中心在根本上有所不同。虽然中国传统诗论中存在“诗无达诂”的说法，经典作品也确实蕴含丰富的内容，但是解读作品仍应以文本和作者为主要出发点。读者主体是相对的，文本对读者解读有着最后的限度和制约。《停云》作为一个经典作品，历来对其解说众多，包涵政治伦理、思想、文学等多个方面。然细读文本，分析异文、注释、内容和章法结构，并结合创作背景和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来看，“日常春日思友诗”最为贴切。从接受史的角度“寓规谏说”是陶诗政治化的一个趋势，仍有其意义，正是这些“意义”构成了《停云》这首小诗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刘克庄. 后村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陶渊明, 撰; 逯钦立, 校注. 陶渊明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4] 蔡丹君. 《陶渊明集》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唐代世俗社会的影响 [J]. 文学评论, 2023(6).
- [5] 鲁迅.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6] 王瑶. 陶渊明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7] 杨勇. 陶渊明集校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8]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9] 周斌, 杨华, 主编. 陶渊明集版本荟萃(上)·陶元亮诗四卷 [M]. 陶潜, 撰.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 [10] 钱志熙. 李邕《古诗四言》帖在古诗校对方面的价值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7(1).
- [11] 张德恒.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发覆——兼论《停云》诗的作年与主旨 [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7(1).
- [12]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3] 许红英. 陶渊明《停云》《时运》《荣木》拟束皙《补亡诗》辩 [J]. 文学前沿, 2005(1).
- [14] 沈约. 宋书·隐逸传(第八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5]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6] 李文初. 陶渊明略论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17] 邓小军.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 [J]. 晋阳学刊, 2007(5).
- [18] 刘奕. 诚与真: 陶渊明考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 [19] 杨忠慧. 陶渊明诗文中的“云”意象解读 [J].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6(6).
- [20] 朱光潜. 诗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